图书情报工作
第65卷 第5期 2021年3月

社会规范对大学生网络学术不端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

■ 吴月华 胡杰 李武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 上海 200240

摘 要：[目的/意义]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以及数字教育资源的广泛使用，学术不端行为呈现出有别于传统形式的新特点以及更为迅猛的发展态势。研究聚焦于社会规范对大学生网络学术不端行为的影响，并探索影响其关系的中介变量，以加深对网络学术不端行为发生机制的认识。[方法/过程]鉴于互联网环境中学术不端行为的社会性显著增强，选择从微观视角深入考察社会规范如何对网络学术不端行为产生影响。基于社会认知道德理论、道德四成分模型等理论构建感知严重性和道德判断的序列中介效应模型，并利用在上海市3所不同性质高校学生中收集的问卷调查数据对模型进行检验。[结果/结论]研究发现，社会规范对网络学术不端行为不仅具有显著的直接效应，还具有显著的间接效应；其中的间接效应由两条中介作用途径产生：通过道德判断的独立中介作用；通过感知严重性和道德判断的序列中介作用。相关结果可以为网络学术不端行为的有效预防和治理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对策，也为审视学术不端行为提供了新视角，丰富了有关学术不端的学术研究文献。

关键词：社会规范 感知严重性 道德判断 网络学术不端行为 大学生

分类号：G206

DOI：10.13266/j.issn.0252-3116.2021.05.006

1 引言

学术不端现象在世界范围内由来已久但屡禁不止，是当前教育和学术研究领域持续关注的重要议题之一。我国教育部将学术不端行为定义为“高等学校及其教学科研人员、管理人员和学生，在科学研究及相关活动中发生的违反公认的学术准则、违背学术诚信的行为”[1]。基于以上概念以及英文文献中 academic misconduct 的定义范围[2]，本文所指的学术不端行为不仅包括科研人员的学术不端行为，还包含以学生为主体的学业上的非道德性行为，后者也是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

在我国，学术诚信问题已渗透到学术界的每一个层级，具有较强的普遍性[3]。在科研人员群体中，知名学者被质疑造假、科研人员遭国际期刊撤稿等学术丑闻屡见报端；在高校学生群体中，约有50%的学生认为考试作弊、论文造假等现象经常或时有发生[4]。传统的学术不端行为可分为作弊、剽窃、伪造以及为他人的上述行为提供帮助4种基本类型[5]，然而随着互联网、智能终端的普及以及数字教育资源的广泛使用，上述分类的内涵实现了极大程度的拓展，学术不端行为呈现出了有别于传统形式的新特点：通过互联网获取所需信息已成为参与学术不端的主要辅助手段，通过线上交易（如论文和数据买卖等）实施学术不端渐趋流行。互联网不仅丰富了实施学术不端行为的途径和可供利用的信息资源，还充分降低了学术不端参与的难度和成本，为其具体开展提供了诸多便利[6-7]。因此，与传统形式的学术不端行为相比，互联网环境下的学术不端行为近年来呈现出更为迅猛的发展态势。学术诚信问题不仅有碍学生优良道德的培养，还会对高校及科研机构的声誉造成重创，动摇公众对知识群体甚至科学本身的信任，不利于崇尚诚信的社会风气的建立。为了严肃查处学位论文抄袭、买卖、代写等学术不端行为，教育部于2020年8月出台相关文件，要求全国高校全面复核近5年研究生学位的论文，并严格落实过程管理，开展警示教育，以推动学术道德与学风建设。

面对新媒体技术所致的学术环境和学术诚信行为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大数据时代青少年诚信发展及培育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6BXW003）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吴月华（ORCID：0000-0001-9518-3513），副教授，博士，E-mail：yhwu22@sjtu.edu.cn；胡杰（ORCID：0000-0003-2266-0926），硕士研究生；李武（ORCID：0000-0002-1633-2363），教授，博士。
收稿日期：2020-10-11 修回日期：2021-01-07 本文起止页码：61-71 本文责任编辑：徐健

的变化,对高校学生网络学术不端行为加以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和现实意义。笔者重点关注大学本科生群体在学业中以网络资源为辅助或以网络平台为依托的剽窃、伪造、买卖数据及论文等非道德行为。国内外有关学生群体学术诚信的研究已有相当长的历史,文献也非常丰富。现有研究多聚焦于探究学术不端行为的发展现状[8]、影响因素以及学术不端的防治对策[9]等。其中影响因素是学术不端行为研究的重点,如个体内在因素(如人格特质和道德等)[10-11]和外部环境因素(如信息技术和同伴影响等)[12-13]的影响。在诸多影响因素中,社会环境相关因素(如主观规范、社会压力等)获得了学者们的普遍关注[14]。然而就笔者所知,虽然已有诸多学者发现社会环境因素会显著影响学生的学术不端行为,但鲜有研究探讨社会因素对于学术不端行为的具体作用机理。在互联网之前的传统学术环境下,个体参与学术不端一般是相对孤立的个人行为,社会辐射面较小,影响较为有限。而在当今互联网环境下,学术不端行为无论是从参与层面还是其影响辐射强度来说都更易形成群体效应,也更易发酵为社会性事件(如2019年的"翟天临学术造假"事件),这意味着互联网环境中学术不端行为的社会性显著增强,新媒体可能导致的社会环境/规范的变化及其对学术不端行为的影响机制因而有了更为突出的研究价值。笔者将聚焦于社会规范对大学生网络学术不端行为的影响,探索影响其关系的中介变量,以期从更加微观的角度了解其具体作用机制。

2 文献综述及研究假设

社会规范是社会环境因素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心理学领域的一个核心概念,具体指特定的社会群体或文化情境中受到民众普遍认可并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15]。社会规范在影响个体行为决策、解释个体行为改变方面的重要作用已得到诸多研究的证实[16-18]。R. B. Cialdini及其同事将社会规范区分为描述性规范(descriptive norms)和指令性规范(injunctive norms)两种[19]:描述性规范是指个体对特定社会情境中他人真实行为的感知;指令性规范指的是个体关于某种行为是否会被他人认可或否定的感知[20]。指令性规范与计划行为理论[21]中的主观规范(subjective norms)具有相同的概念内涵,因而在相关研究中指令性规范与主观规范经常会被相互替换使用[22-23]。笔者着重探究社会规范中的指令性规范对大学生网络学术不端行为的作用机制,即大学生所感知到的社会环境中的他人是否认可相关行为对其行为决策的影响机制,因而下文中提到的社会规范除有另指外均为指令性规范(主观规范)。

心理学、社会学、犯罪学等多个领域都有理论阐释社会环境/规范对于个体行为尤其是道德相关行为的重要作用。根据著名心理学家L. Kohlberg(1976)[24]的道德发展阶段论,大部分青少年及大学生的道德发展属于第2层(共3层)习俗层(conventional)的第3阶段(共6阶段),这一阶段道德观念的主要特征是以他人的判断标准作为发展自我道德观念的方向。在此阶段的个体最希望得到周边人的认同和肯定,认为满足大众期望的行为便是好的行为。T. Hirschi(1969)[25]的社会控制(社会键)理论也明确指出,个人(尤其是青少年)在社会化过程中和父母亲朋、老师同学等建立的社会关系,及其所衍生的相关社会条件和期望是控制个体是否有越轨行为的关键要素。A. Bandura的社会认知道德理论(the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of morality)同样指出个体道德标准的形成部分依据的是生活中的"重要他人"(significant others),如父母师友对自己行为的反应。当个体行为达到或超过价值标准时,家长和其他人通常会感到高兴,而当他们的表现达不到标准时,则会感到失望。在这种评估性反应(evaluative reactions)的作用下,个体最终会形成自我肯定和约束的道德性行为标准[26]。

互联网环境中的学术不端行为虽然具有一些新特点,也出现了部分新形式,但是其本质仍属于违反学术界行为规范的越轨行为,也是以上理论所涵盖的(学术)道德类行为,因而个体所在社会环境中的他人对该行为的态度会对个体行为产生重要影响。本研究中的社会指令性规范是指学习相关环境中的重要他人对其学术不端行为可能的评估性反应,即父母、师友、同学等对其实施该行为所持有的态度(认可/否定程度)。基于前文相关理论的观点,当个体认为所处社会环境中的重要他人对其实施学术不端行为不会予以否定时,个体便会倾向于参与其中;而当个体认为父母、师友等对该行为持以反对、拒绝的态度时,个体则可能考虑避免该行为的发生[27]。既有研究也表明,指令性/主观规范是个体是否参与学术不端行为的重要预测因素。M. Koljatic等[28]发现,父母对于学术不端行为的接受程度对个体的作弊行为具有显著影响;G. J. Curtis等[29]发现,两种社会规范(尤其是指令性规范)能够直接预测学生的学术剽窃行为。综合以上所述,当个体感知到周围的重要他人对学术不端行为的否定程度

越强时,个体参与网络学术不端行为的可能性就越低,因而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H1.社会规范(否定倾向)对个体网络学术不端行为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

组织伦理学是研究道德/伦理决策的一个重要领域。该领域的著名学者 T. M. Jones 在 1991 年的经典文献里提出了道德强度(moral intensity)这个概念[30],以指特定情境中具体道德事项的紧要程度;同时强调了道德强度能够有效地预测道德判断并最终影响道德决策。道德强度作为一个与道德问题本身特征相关的(issue-contingent)因素,可以被归为除个体因素(主体)、组织因素(环境)之外的第 3 类道德决策影响因素。T. M. Jones 之后的许多实证研究都证明了道德强度对道德决策的显著影响[31－32]。1996 年,D. P. Robin 等扩展了道德强度概念,提出了一个与之类似但又有区别的新概念－伦理/道德问题的感知重要性(perceived importance of an ethical issue,PIE)[33]。D. P. Robin 等认为,由于 PIE 强调的是不同个体对道德/伦理事项重要性的独特感知,能更接近个体的行为意愿或行为决策,因而相比道德强度能够更好地预测个人道德决策。笔者也认为,虽然 PIE 实质上属于个体内在因素,但是由于个体感知的差异源于不同个体不同程度的道德敏感度、道德发展水平、价值观、外界压力和机会、和他人的关系等多个自身和环境变量[32],在某种程度上 PIE 变量综合了前文所提的第一类个体因素、第二类环境因素以及第三类道德事项因素的多种元素,因此该变量理论上应能很好地预测道德决策。基于此,笔者选择重点考察 PIE 在大学生网络学术不端行为决策过程中的中介作用。鉴于本文议题的非诚信/非道德属性,以及语义及逻辑通顺的缘故,下文中将 PIE(感知重要性)简译为感知严重性。

感知严重性,顾名思义,强调的是个人的主观感知,而非事物的客观属性,因而不同的人对同一事项的感知严重性/道德性可能完全不同,甚至于同一个体在不同的时间点或不同的情境中对同一事项的严重性感知都可能存在差异[33]。社会认知理论认为,个体的社会环境会影响个体内在认知,而且多数情况下环境都是先通过影响认知继而影响行为[34]。社会影响相关理论也认为,社会规范类因素(如他人提供的奖惩性反馈)是个体态度产生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个体能从社会环境的反应中形成自己对事物的评估和判断[35]。笔者所讨论的社会指令性规范指的是大学生所感知到的周围重要他人对于自己开展网络学术不端行为的可能反应,是个体行为所产生的社会性后果(肯定或否定),这种社会反馈机制自然会影响个体对该行为的评价及认知。具体而言,这种指令性规范会影响到个体对于网络学术不端这种道德性问题的严重性(类似道德强度)感知。当个体感知到自己的父母、师友、同学等对网络学术不端行为明显持有否定的态度时,个体可能会在社会压力的作用下内化对于学术不端行为严重性(即对该特定行为非道德程度)的感知;如果个体在自身经验的基础上判断周围人群中针对该类行为的负面态度和社会压力较低时,他/她就极可能做出相对应的严重性判断,认为相关行为不会产生严重的社会后果,从而忽视该事件本身的道德属性,认为其严重性低。简言之,社会规范会显著影响个体对网络学术不端行为严重性的感知。

道德强度对道德决策/行为的预测作用已被很多研究所证实[36－37]。作为与道德强度相通的概念,感知严重性对道德行为的预测作用也值得关注。笔者认为,当个体觉得网络学术不端行为越严重,表明个体越能认识到相关行为中所包含的道德伦理成分,更能意识到相关行为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如学校惩罚),个体就越会倾向于做出符合伦理、规避后果的不参与决策;而感知严重性低的个体则会倾向于认为相关行为不会有严重的社会后果,也无显著的道德性,对参与网络学术不端行为就会有较少的心理负担,相对更容易受其他因素驱使而成为学术不端行为的实施者。既有研究也表明,感知严重性与个体学术不端行为显著负向相关[38－39]。基于上述论述,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H2.社会规范通过感知严重性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个体的网络学术不端行为。

J. Rest[40]的道德四成分模型(four-component model)认为,个体的道德决策过程包含 4 个主要方面(步骤):①识别道德情景(道德敏感性/意识);②作出道德判断;③形成道德意向(道德动机);④实施道德行为。其中,道德判断是该模型的一个核心要素,指对某一特定情境/议题有关道德正误的判断。一般而言,道德正确是个体决定实施某种行为的基本前提,因而道德判断能够显著预测个体的道德决策(意愿或行为)。道德四成分模型在商业伦理等道德决策领域被广为应用,个体的道德判断对其道德决策的预测作用也在诸多研究中得以验证,如 R. B. Patrick 等[41]发现,道德判断能够显著预测青少年利他行为的参与;也有研究表明,大学生群体的道德判断与其反社会行为负向相关[42]。S. J. Reynolds 等[43]发现,道德判断既能够独

立影响道德行为,也能在某些情况下与道德认同交互作用于道德行为。本研究中的道德判断是指个体对于网络学术不端行为是否为不道德的判断,当个体感知到网络学术不端行为是不道德的,且感知程度越强,个体就越会倾向于做出符合社会道德伦理的不参与行为,因而道德判断对学术不端行为应会有显著预测作用。此外,从道德判断的前置变量来看,社会规范作为社会环境变量也可能会影响个体的道德判断。如前文所述,个人对于特定情境/行为的判断与评价极易受到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关系的影响。就道德认知而言,大学生已经具备从社会环境中的他人反应解读道德含义的能力,父母师友等生活中重要他人的评估性反应更是可能直接影响他们对于相关情景/行为的认知。当个体的父母、亲友等对某行为予以认可时,个体也会受其影响倾向于认为该行为是正确、可取的,即社会规范可以影响个体对于某特定行为的评价,这一关系也在既有研究中得到了证实[44-45]。具体到本研究,如果个体感知到周边的人对学术不端行为的反应是负面的、抵触的、批判或惩罚性的(否定性社会规范程度越高),个体就会倾向于将该行为判断为违反规范的、非道德的;反之,如果个体感知到践行相关行为的社会压力较低,他/她对相关行为非道德程度的判断也会越低。因此,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H3.社会规范通过道德判断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个体的网络学术不端行为。

综上,感知严重性和道德判断均可能为社会规范与网络学术不端行为之间的中介变量,那这两个中介变量之间的关系又如何呢?上文提到,J. Rest的道德四成分模型提出道德决策的第一步是识别特定情景/行为是否具有道德属性,感知到某一情境/行为具有道德伦理属性是个体开展道德判断的前提条件。由于个体生理和心理发展的差异性,个体的道德敏感性也有区别。D. P. Robin等认为感知严重性与道德敏感性有相似相通之处,因而提出感知严重性与道德判断显著相关的假设[33],他们以及更多学者的研究结果都证明了个体对事物的感知严重性/重要性程度能显著预测其对特定情境/问题的道德判断[46]。具体而言,当个体感知到某行为严重程度越高,他/她就越会倾向于判断该行为具有道德伦理成分,从而越有可能判断该行为是不道德的。这意味着本研究中个体对网络学术不端行为严重程度的感知应能显著预测其对该行为道德与否的判断。与此同时,前文已假设感知严重性的前置变量:社会指令性规范会影响个体对于网络学术不端行为严重程度的感知;同时上文也讨论了道德判断的后置变量:对学术不端行为的道德判断能显著预测其现实生活中的学术不端行为。结合上述各因素间关系的讨论,笔者推论,感知严重性与道德判断在社会规范和网络学术不端行为两者的关系中具有前后序列的中介作用。

H4.社会规范通过感知严重性和道德判断的序列中介作用影响网络学术不端行为。

本研究最终构建的概念模型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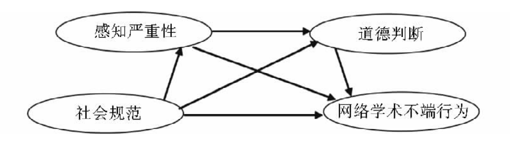


图1 感知严重性和道德判断的序列中介效应检验模型(概念模型)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对象及步骤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在开展正式调查之前对问卷进行了预测试,在2个本科班级回收50份问卷。预测试表明,大部分核心变量具有较好的信效度,但是有个别变量的信度未达到理想水平,因而根据预测试结果调整了相关变量的问项数目以及表述方式。

笔者于2020年3月正式开展问卷调查。首先,为使样本数据更有代表性,选取了上海地区的1所综合类重点"985"高校和2所市属普通高校的大学本科生为目标调查对象。然后,在这3所大学尽可能找到有代表性的不同专业学生发放问卷。具体步骤为:项目组成员和通过线下资源找到的各学校不同专业的联络人通过微信群将问卷链接投放在相关班级群、年级群或社团群中,并给每位填答者发放2元微信红包以示感谢。本次调查共回收到512份问卷,在剔除作答记录具有明显前后逻辑矛盾、作答时间明显不足(以120秒为最低时长标准)的问卷后,最终用于数据分析的有效问卷为475份,问卷有效率为92.77%。

3.2 测量

对社会(指令性)规范的测量改编自计划行为理论中的主观规范量表[27],共有5个问项,分别问个体感知到的周边好友、同学、家人、教师等发现个体有学术不端行为后的可能态度和反应(如:"如果我的好友发现我有学术不端行为,他/她是不会介意的""如果周围的同学发现我有学术不端行为,他们会看不起我")。参与者被要求使用里克特五级量表(1=极不

赞同,5 = 非常赞同)报告最能代表自己意见的选项(α =0.79),最后取各问项的平均值作为社会规范变量的分值。求均值前,个别问项被反向编码以与其他题项概念相一致。最终变量分值越高,个体感知到周围的重要他人对学术不端行为的态度越负面。

对网络学术不端行为的测量采用里克特五级量表(1 = 从不,5 = 总是),要求参与者根据自己在就学期间的网络学术不端行为实际发生频率选择合适选项。该量表所列举的网络学术不端行为共 14 项,是在现有学术不端相关文献及量表的基础上,特别针对网络环境中学术不端行为的常见形式编制而成。具体题项如:“从网上复制他人作业/论文/成果而不加以标注或引用”“将网上所得数据或资料经编造、修改或整合后用于自己的作业或论文”“通过网络联络或交易,雇人代写或购买毕业论文”“通过网络联络或交易,替他人代写毕业论文或期刊投稿论文”等。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α = 0.89)。最后取平均值作为变量分值,分值越高,个体参与网络相关的学术不端行为频率越高。

对感知严重性的测量改编自 D. P. Robin 等提出的伦理问题的感知重要性量表[33],要求参与者使用里克特五级量表(1 = 完全没问题,5 = 非常严重)对 14 种网络学术不端行为的每一种进行严重程度的评价,共 14 个题项。这种感知严重性的测量方法在现有文献中被广泛使用[47 – 48]。该量表信度非常理想(α = 0.95)。最后取平均值作为变量分值,分值越高,个体觉得这些学术不端行为越严重。

对道德判断的测量主要参考 R. E. Reidenbach 等提出的道德判断量表编制而成[49],通过 5 个问项测试个体对于网络学术不端行为是否道德的看法(如:“网络学术不端行为在道德层面上是错误的”“网络学术不端行为实质上不算什么错”),参与者使用里克特五级量表对相关陈述做出认同程度的相应选择(1 = 极不赞同,5 = 非常赞同)。该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α = 0.72)。最后取平均值作为变量分值,求均值前,个别问项被反向编码以与其他题项概念一致。最终分值越高,个体越认为学术不端行为在道德上是错误的。

4 数据分析及结果

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数据分析结果显示,调查对象中男性占比46.9%,女性占 53.1%;年龄分布介于 17 – 25 岁之间,平均 20.5 岁;61.5% 的调查对象为重点院校学生,38.5% 为普通省/市属高校学生。就年级分布而言,低年级(大一大二)学生占比略低(约为 40%),高年级本科生约占 60%。在专业分布上,本研究在常规专业分类基础上,结合学术不端文献重点关注的相关专业[50 – 51]将学科方向进行分类整理,具体分布为:工学类(43.2%),文学类(22.9%),理学类(10.9%),经管类(10.9%),医学类(8.2%)和法学类(3.8%)。

表 1 列出了本研究 4 个核心变量的基本描述统计分析结果以及两两变量之间的皮尔森相关系数。数据显示,所有变量之间都呈显著相关关系,其中:网络学术不端行为与社会规范、感知严重性、道德判断之间呈显著负相关;道德判断与社会规范、感知严重性之间呈显著正相关;感知严重性与社会规范之间呈显著正相关。

表 1 基本描述统计数据及核心变量相关分析

核心变量	M	SD	1	2	3	4
1 社会规范	3.89	0.65	1			
2 感知严重性	4.31	0.67	0.41 **	1		
3 道德判断	4.19	0.61	0.48 **	0.49 **	1	
4 网络学术不端行为	1.35	0.42	–0.28 **	–0.24 **	–0.38 **	1

注: *** $p < 0.001$, ** $p < 0.01$, * $p < 0.05$

表 1 数据同时显示,调查对象普遍认为网络学术不端行为相当严重(M = 4.31, SD = 0.67,平均值远高于中间值),自我报告的网络学术不端行为的整体参与频率则相当低(M = 1.35, SD = 0.42,平均值远低于中间值)。鉴于问卷所调查的网络学术不端行为有 14 种,笔者想进一步探究这些不端行为的频率以及相关态度是否存在类别差异,因此对这 14 种行为以及相关严重性题项进行了探索性因子分析。问卷中行为和严重性题项的 KMO 值均为 0.93,χ^2 = 8157/7583(df = 91, p = 0.000),符合开展因子分析的前提条件。通过采用主成分提取法和正交旋转法中的最大方差旋转法,共萃取到两个公共因素,解释总变异量为 74.89%(行为)/76.73%(感知严重性)。数据显示,问卷所调查的 14 类网络学术不端行为可分为两大类(具体题项见表 2):第一类包括随意引用网络资料未注明出处、通过网络途径获取考试/作业题目或答案等 4 种较常见的个体信息检索类行为(α = 0.78);第二类包括通过互联网进行联络或交易的各类课程作业和论文的买卖行为(α = 0.97),这一类不端行为牵涉金钱和多方交易,性质更为严重,属于文献中所提到的合同类作弊(contract cheating)行为[52]。配对样本 t 检验进一步表明,大学生认为网络信息检索类不端行为的严重性(M = 3.85, SD = 0.77, α = 0.82)要显著低于合同类作弊

行为($M=4.50$, $SD=0.73$, $\alpha=0.97$), $t=-19.47$, $p<0.001$。与之相对应,自我汇报的网络信息检索类不端行为的发生频率($M=1.89$, $SD=0.72$)显著高于合同作弊行为频率($M=1.14$, $SD=0.45$), $t=22.03$, $p<0.001$。虽然两种不端行为的频率都低于中间值,但从参与人数的比例来看,参与问卷的大学生中有 84% 的人都有过网络相关作弊行为,其中 19% 的人有过网络合同类作弊行为,82% 的人参与过信息检索类不端行为。

表 2　网络学术不端行为的探索性因素分析

因素问项	第一类	第二类
从网上复制他人作业/论文/成果而不加以标注或引用	.086	.832
随意引用网络资料未注明出处	.024	.796
(在老师不允许情况下)通过网络途径获取考试、作业题目或答案	.146	.670
将网上所得数据或资料经编造、修改或整合后用于自己的作业或论文	.089	.765
在网上买卖实验或论文数据(包括所需结果)	.544	.363
通过网络联络或交易,雇人代写除论文之外的其他课程作业	.865	.113
通过网络联络或交易,雇人代写或直接购买课程论文	.934	.092
通过网络联络或交易,雇人代写或直接购买毕业论文	.929	.114
通过网络联络或交易,雇人代写或直接购买期刊投稿论文	.944	.099
通过网络联络或交易,雇人代写或直接购买上述 3 种类型以外的其他论文或报告(如社会实践调查报告、学术竞赛论文等)	.938	.115
通过网络联络或交易,替他人代写除论文之外的其他课程作业	.858	.100
通过网络联络或交易,替他人代写课程论文	.902	.103
通过网络联络或交易,替他人代写毕业论文或期刊投稿论文	.948	.100
通过网络联络或交易,替他人代写上述 3 种类型以外的其他论文或报告(如社会实践报告、学术竞赛论文、科创论文、职称评审论文等)	.928	.098

4.2　序列中介效应检验

笔者采用 A. F. Hayes(2012)[53]编制的 Process 宏中的模型 6,对感知严重性与道德判断在社会规范与网络学术不端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加以检验。如果检验效果在 95% 置信度下的偏差校正 Bootstrap 置信区间中不包含 0,说明中介效应成立[54]。鉴于有众多研究发现性别对学术不端行为有显著影响[55],本研究将性别作为控制变量。

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总体上,社会规范能显著负向预测网络学术不端行为($\beta=-0.27$, $p<0.001$),假设 1 成立;社会规范能显著正向预测感知严重性($\beta=0.40$, $p<0.001$);社会规范($\beta=0.34$, $p<0.001$)和感知严重性能显著正向预测道德判断($\beta=0.36$, $p<0.001$);当社会规范、感知严重性和道德判断同时进入回归方程时,社会规范($\beta=-0.11$, $p<0.05$)和道德判断($\beta=-0.31$, $p<0.001$)均能显著负向预测学术不端行为,但感知严重性不能显著预测学术不端行为($\beta=-0.03$, $p>0.05$)。

表 3　模型中变量的回归分析

回归方程(N=475)		整体拟合指数			回归系数显著性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R	R^2	F	β	t
感知严重性	性别	0.43	0.18	53.03***	0.12	2.83**
	社会规范				0.40	9.46***
道德判断	性别	0.58	0.34	80.50***	−0.05	−1.26
	社会规范				0.34	8.33***
	感知严重性				0.36	8.63***
网络学术不端	性别	0.40	0.16	22.74***	−0.05	−1.24
	社会规范				−0.11	−2.23*
	感知严重性				−0.03	−0.69
	道德判断				−0.31	−5.94***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见表 4 和图 2):社会规范可以直接作用于个体的网络学术不端行为,直接效应值为 −0.07;感知严重性与道德判断在社会规范与学术不端行为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值为 −0.11,约占社会规范对学术不端行为总效应(−0.18)的 60%。具体而言,中介效应由 3 条(其中两条显著)路径产生的间接效应构成:通过"社会规范→感知严重性→网络学术不端行为"途径产生的间接效应 1;通过"社会规范→道德判断→网络学术不端行为"途径产生的间接效应 2;通过"社会规范→感知严重性→道德判断→学术不端行为"途径产生的间接效应 3。间接效应 1 的 Bootstrap95% 置信区间包含 0 值,表明间接效应 1 未达到显著水平,因而感知严重性在社会规范和网络学术不端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并不显著,假设 2 不成立;而间接效应 2 与间接效应 3 的 Bootstrap95% 置信区间均不包含 0,由此可知这两个间接效应均达到显著水平,中介效应显著,假设 3 和假设 4 均成立。

表 4　感知严重性和道德判断的序列中介效应检验

中介路径	效应值	Boot CI 下限	Boot CI 上限	相对中介效应
总间接效应	−0.11	−0.15	−0.07	59.60%
社会规范→感知严重性→学术不端	−0.01	−0.04	0.02	–
社会规范→道德判断→学术不端	−0.07	−0.10	−0.04	38.61%
社会规范→感知严重性→道德判断→学术不端	−0.03	−0.05	−0.01	15.95%

注:Boot CI 下限和 Boot CI 上限分别指通过偏差矫正的百分位 Bootstrap 法估计的间接效应的 95% 置信区间的下限和上限;所有数值通过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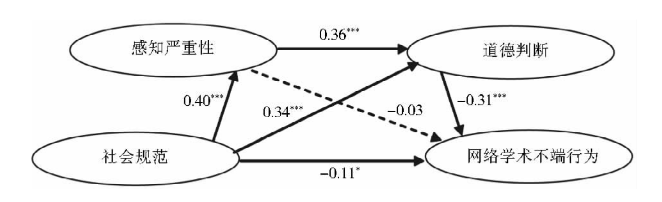


图 2 序列中介效应模型(标准化系数)

5 主要发现和讨论

笔者探讨了社会规范对网络学术不端行为的影响及其具体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社会规范对网络学术不端行为不仅具有显著的直接效应，还具有显著的间接效应。其中的间接效应通过两条中介作用途径产生：①通过道德判断的独立中介作用；②通过感知严重性和道德判断的序列中介作用。

从网络学术不端行为的现状来看，本研究数据显示网络学术不端行为可归为两大类：信息检索类和合同作弊类。虽然大学生自我汇报的这两类行为的平均参与次数都很少，但参与普遍度相当高：调查对象中总体有 84% 的人有过网络相关学术不端行为，其中有 19% 的人通过网络平台有过合同类作弊行为。在国外，英国学者 P. M. Newton[56] 通过对 1978 年至 2016 年间有关高等院校合同类作弊英文文献的元分析发现，大学生合同类作弊行为和总体学术不端行为均呈缓慢但逐年上增趋势。就合同类作弊行为参与比例而言，所有研究样本(共 65 篇)平均有 3.52% 的参与比例，其中最低的样本汇报参与率为 0，最高的样本汇报参与率则超过了 20%。但该研究未区分线上和线下的合同类作弊，也未讨论互联网在该行为增长趋势中的作用。笔者发现我国大学生网络学术不端总体行为以及合同类作弊行为的参与比例都基本达到了该元分析发现的最高(非平均)参与率。相较于国外 3.52% 的平均比例，我国高达 19% 的网络合同类作弊以及 84% 的总体网络学术不端比例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①当前的互联网学术环境确实极大地丰富了实施学术不端行为的途径和可供利用的信息资源，也显著降低了学术不端参与的难度及被发现的风险，因而互联网环境下的学术不端行为在我国(可能同样在国外)呈现出日益普遍且迅猛的发展态势；②在互联网所提供的便利平台基础上，由于学术环境、学术文化以及学术机制等的差异，如参照目前英文文献所提供的数据，我国高校的网络学术不端行为现状，特别是合同类作弊行为现状在国际上已属严重级别。

本研究中除了假设 2 之外的其他假设均成立。首先，社会指令性规范对网络学术不端行为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即个体所感知到的周围的"重要他人"对网络学术不端行为所持有的负面态度或否定行为倾向越明显，个体的网络学术不端参与程度越低，假设 1 获得支持。这一发现验证了心理学和社会学等领域相关理论所阐释的社会环境，尤其是其中的社会关系对个体行为的重要影响。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体具有建立并维持社会关系的需要，并因此产生遵从社会规范以获得社会认同、规避社会排斥的动机。满足大众期望，尤其是获得父母、亲友、同学等重要他人的期望或肯定更是青少年和大学生发展自我道德观念、形成个体道德标准和道德决策的关键要素。社会指令性规范某种程度上体现了相关行为的适当性(appropriateness)，因而是个体用于判断自身行为是否能获得社会认同的重要根据之一[15]。网络学术不端是违反学术行为规范的越轨行为，对于大学生来说，社会环境中的重要他人对该行为的评估性反应(如反对、批评、举报等态度或行为)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压力自然会作用于其最终的行为决策：社会指令性规范显示的负面态度越强，社会压力越大，体现该类行为的适当性越差，学生的自我约束意愿就会越强，越不会参与网络学术不端行为。此结论也与传统线下学术不端的影响机制相一致。这说明在新媒体环境下，学术诚信教育也要特别强调学校、家庭及社会等相关环境因素对学生个体的影响，要充分发挥社会关系及指令性规范在学生学术道德教育中的关键作用。

感知严重性是本文中介效应模型中最核心的变量之一。虽然数据显示社会指令性规范确实能显著预测个体对网络学术不端严重性的感知，感知严重性却不能直接显著预测网络学术不端行为，因而假设 2 所提出的感知严重性在社会规范与网络学术不端行为之间的独立中介效应并不存在。然而，数据显示感知严重性能先通过影响个体对网络学术不端行为的道德判断，继而影响个体的学术不端行为，即假设 4 的序列中介效应存在。如前文所述，社会环境往往先通过影响个体认知继而影响个体行为。当大学生感知到自己的父母、师友、同学等对学术不端行为明显持有否定性的态度时，个体就会做出相对应的严重性判断，认为网络学术不端行为可能有严重的社会后果或不适当性，从而重视该事件本身的道德属性。我们的研究证实了假设 2 中介效应的前半条路径，即社会指令性规范能显著预测感知严重性，然而，中介效应的后半条路径与我们的预期假设不符：个体对相关行为严重性的感知并

不能直接影响其道德决策(即网络学术不端行为的实施)。此结果与之前文献所发现的感知严重性显著负向预测(网络)学术不端行为的结论[39]并不一致,但却与研究道德决策中介变量的多篇文献结果[33,44]相一致:即感知严重性对道德意愿/行为没有显著的直接作用,但却有通过道德判断施加的间接作用(即假设4的序列中介作用)。究其原因,笔者发现学术不端文献之所以发现感知严重性对学术不端具有显著影响,很可能是因为相关研究仅运用了多元回归分析检验了感知严重性对道德行为的总体效应,而未探究其微观的影响路径(有间接效应、无直接效应)。基于此发现,笔者在(网络)学术诚信案例中验证了Rest道德四成分模型所提出的道德决策的关键因素和路径,即道德意识(感知严重性)通过道德判断作用于道德意愿/行为。这也说明,为了有效防范大学生的学术失范行为,学术诚信实证研究可在探究学术不端行为基本影响因素(如环境影响)的基础上拓展深度,进一步探查这些因素影响学术不端行为的具体路径,以便在对高校学生学术不端行为的干预中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措施。

除了与感知严重性一起具有序列中介作用之外,道德判断在社会规范与网络学术不端行为之间还具有独立中介作用,而且该独立中介效应的占比明显高于序列中介效应。这说明社会指令性规范可通过作用于道德判断而间接影响个体的网络学术不端行为:当大学生感知到周边的重要他人对网络学术不端行为持有的否定态度越强,他/她就会越倾向于认为相关行为在道德上是错误的,从而越不可能参与该行为。其独立中介和序列中介作用表明,道德判断是影响个体网络学术不端行为的重要因素,是社会指令性规范影响个体学术不端具体作用机制中的关键一环。如前文所述,对于青少年和大学生而言,社会环境中他人的道德判断标准和评估性反应是形成自我道德观念、实施自我肯定和约束的道德性行为标准。道德判断反映了个体对相关行为的道德认知,周围重要他人的否定态度会促使个体做出相关行为道德错误的判断。在社会环境中,大部分人都会知其不可为而不为(规避不道德行为),网络学术不端行为由此得到遏制。道德判断的解释效力凸显了个体认知(道德意识和相关判断)在预防与治理网络学术不端行为中的关键作用。基于此发现,学校、家庭及相关机构可以理论结合实践,采取教育、惩治、家校协同等相关举措加强学生对于网络学术不端行为严重性的感知,进而强化学生对相关行为非道德性程度的认知,引导学生对学术不端行为道德属性进行正确的判断,从而实现学生自觉拒绝参与网络学术不端的目的。

6 贡献、不足及展望

笔者探讨了社会指令性规范对于网络学术不端行为的影响,以及感知严重性和道德判断在其中的序列中介作用。考虑到目前有关学术不端影响因素的研究文献多数基于较为宏观的视角,着眼于各种因素的罗列检测,笔者以社会环境因素为出发点,从微观视角深入考察了社会规范如何通过道德意识(感知严重性)和道德判断的中介作用对网络学术不端行为施加影响。针对该作用机制的验证能帮助我们厘清外在社会环境与个人内在道德认知在制约网络学术不端行为中的相互作用和关系,这不仅可以加深我们对于网络学术不端行为发生机制的认识,为如何实践网络学术不端行为的有效预防和治理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对策,还在一定程度上为审视学术不端行为提供了新的视角,丰富了学术不端研究文献。

其次,如前所述,在当前的互联网学术环境中,学术不端出现了新平台、新现象和新方式,本研究以网络学术不端行为为研究主题,丰富了以线下学术不端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既有文献,增加了线上学术不端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发生机制的相关知识,并为我们提供了与传统学术不端行为机制做比较的机会,以便我们进一步了解互联网环境中学术不端行为是否具有新的特点与发生机制。另外,正如有学者指出,学术诚信问题仅借助相关制度建设是不够的,如能借助道德伦理进行约束将能提供有效的补充[57]。笔者发现感知严重性和道德判断是影响学术不端行为的显著中介变量,而这两个因素都是与道德相关的主观感知变量,因此在实际教育过程中,教育工作者、教育机构和家庭可以采取相应措施,引导大学生对网络学术不端行为的道德性判断,以期从个体本身的道德伦理认知方面约束自己的学术不端行为,最终促进学术诚信的发展。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主要在于:其一,在研究方法上沿用了自我报告形式的问卷调查法。由于网络学术不端行为的违规属性,作答对象所报告的自我网络学术不端行为频次可能会低于真实水平,由此可能会对研究结果产生一定的影响。其二,在样本选取方面,虽然本研究选取了重点与普通高校的研究对象,但重点高校的学生样本量较大;此外,所有参与调查的学生都来自上海地区,因而研究结果尚不足以代表国内大学生

群体。考虑到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论文发表的任务和压力更为突出,以互联网络为辅助的学术不端行为(如论文抄袭、买卖和代写的现象)在研究生群体中可能更为普遍,所以后续研究可以针对研究生群体再展开调研。此外,考虑到学术诚信问题与学校类别可能有较大关系,今后的研究可进一步增加其他高校特别是普通类高校以及其他城市的样本研究。考虑到国内外的学术环境、学术监督机制以及不同文化对道德认知的可能影响,之后也可以考虑在其他国家进行数据收集以开展国内外对比研究。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EB/OL]. [2021 – 01 – 01].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2/s5911/moe_621/201607/t20160718_272156.html.

[2] MCCABE D L, TREVINO L K. Individual and contextual influences on academic dishonesty: a multicampus investigation[J]. Research in higher education, 1997, 38(3): 379 –396.

[3]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 反腐倡廉蓝皮书:中国反腐倡廉建设报告 NO.8[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147 – 167.

[4] 武晓峰,王磊,张颖. 我国研究生学风和学术道德现状的调查与分析[J]. 学位与研究生教 育,2012(3):18 –23.

[5] PAVELA G. Applying the power of association on campus: a model code of academic integrity[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1997, 16(1): 97 –118.

[6] ŞENDAĞ S, DURAN M, ROBERT F M. Surveying the extent of involvement in online academic dishonesty (e-dishonesty) related practices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and the rationale students provide: one university's experience[J].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12, 28(3): 849 –860.

[7] KAUFFMAN Y, YOUNG M F. Digital plagiarism: An experimental study of the effect of instructional goals and copy-and-paste affordance[J]. Computers & education, 2015, 83(4): 44 –56.

[8] 刘普. 我国学术不端问题的现状与治理路径——基于媒体报道的 64 起学术不端典型案例的分析[J]. 中国科学基金,2018,32(6):637 –644.

[9] 蒋来,詹爱岚. 高校科研活动中的不端行为及对策研究[J]. 中国科学基金,2015,29(1): 30 –36.

[10] WILKS D C, CRUZ J N, SOUSA P. Personality traits and plagiarism: an empirical study with portuguese undergraduate students[J]. Journal of academic ethics, 2016, 14(3): 231 –241.

[11] PELED Y, ESHET Y, BARCZYK C, et al. Predictors of academic dishonesty among undergraduate students in online and face-to-face courses[J]. Computers & education, 2019, 131(4): 49 –59.

[12] STOGNER J M, MILLER B L, MARCUM C D. Learning to e-cheat: a criminological test of internet facilitated academic cheating[J]. Journal of criminal justice education, 2013, 24(2): 175 –199.

[13] ZHANG Y, YIN H. Collaborative cheating among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the effects of peer influence and 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 orientations[J]. Assessment & evalu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2019, 45(1): 54 –69.

[14] DAUMILLER M, JANKE S. Effects of performance goals and social norms on academic dishonesty in a test[J].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 psychology, 2020, 90(2): 537 –559.

[15] CIALDINI R B, TROST M R. Social influence: social norms, conformity and compliance[M]. GILBERT D R, FISKE S R, Lindzey G. The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New York: McGraw-Hill, 1998: 1 –2, 151 –192.

[16] PARK N, JUNG Y, LEE K M. Intention to upload video content on the internet: the role of social norms and ego-involvement[J].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11, 27(5): 1996 –2004.

[17] WANG Y, CHEN M, LEE J H. Adolescents' social norms across family, peer, and school settings: linking social norm profiles to adolescent risky health behaviors[J].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2019, 48(5): 935 –948.

[18] LAWRENCE N K. Highlighting the injunctive norm to reduce phone-related distracted driving[J]. Social influence, 2015, 10(2): 109 –118.

[19] CIALDINI R B, KALLGREN C A, RENO R R. A focus theory of normative conduct: a theoretical refinement and reevaluation of the role of norms in human behavior[J].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1991, 24: 201 –234.

[20] 陈维扬,谢天. 社会规范的动态过程[J]. 心理科学进展,2018,26(7):1284 –1293.

[21] AJZEN I.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J].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1991, 50(2): 179 –211.

[22] NIEMIEC R M, CHAMPINE V, VASKE J J, et al. Does the impact of norms vary by type of norm and type of conservation behavior? a meta-analysis[J]. Society & natural resources, 2020, 33(8): 1024 –1040.

[23] VAN DEN PUTTE B, YZER M C, BRUNSTING S. Social influences on smoking cessation:a comparison of the effect of six social influence variables[J]. Preventive medicine, 2005, 41(1): 186 –193.

[24] KOHLBERG L. Moral stages and moralization: the cognitive-developmental[M]//LICKONA T. Moral development and behavior: theory, research and social issues.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76.

[25] HIRSCHI T. A control theory of delinquency[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9: 16 –26.

[26] BANDURA A.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of moral thought and action. Handbook of moral behavior and development[M]. New York: Psychology Press, 2014: 69 –128.

[27] BECK L, AJZEN I. Predicting dishonest actions using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J].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1991, 25

(3): 285 – 301.
[28] KOLJATIC M, SILVA M, ARDILES J. Are students' perceptions of parental acceptance of academic dishonesty associated with its occurrence? [J]. Psychological reports, 2003, 93(1): 93 – 97.
[29] CURTIS G J, COWCHER E, GREENE B R, et al. Self-control, injunctive norms, and descriptive norms predict engagement in plagiarism in a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model[J]. Journal of academic ethics, 2018, 16(3): 225 – 239.
[30] JONES T M. Ethical decision making by individuals in organizations: an issue-contingent model[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1, 16(2): 366 – 395.
[31] VALENTINE S, HOLLINGWORTH D. Moral intensity, issue importance, and ethical reasoning in operations situations[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12, 108(4): 509 – 523.
[32] WU Y, CHEN V H H. Understanding online game cheating: unpacking the ethical dimens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2018, 34(8): 786 – 797.
[33] ROBIN D P, REIDENBACH R E, FORREST P J. The perceived importance of an ethical issue as an influence on the ethical decision-making of ad managers [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1996, 35(1): 17 – 28.
[34] BANDURA A. Social foundations of thought and action[M].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1986.
[35] WOOD W. Attitude change: persuasion and social influence[J].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2000, 51(2): 539 – 570.
[36] NILL A, SCHIBROWSKY J A. The impact of corporate culture, the reward system, and perceived moral intensity on marketing students' ethical decision making[J]. Journal of marketing education, 2005, 27(1):68 – 80.
[37] 丁凤琴,纳雯. 真实急病情境下共情对大学生慈善捐助的影响:有调节的中介效应[J]. 心理发展与教育,2015,31(6):694 – 702.
[38] KUKOLJA TARADI S, TARADI M, KNEZEVIC T, et al. Students come to medical schools prepared to cheat: a multi-campus investigation[J]. Journal of medical ethics, 2010, 36(11): 666 – 670.
[39] YANG S C.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related to academic dishonesty: a survey of taiwanese graduate students[J]. Ethics & behavior, 2012, 22(3): 218 – 237.
[40] REST J. Moral development: advances in research and theory [M]. New York: Praeger, 1986.
[41] PATRICK R B, BODINE A J, GIBBS J. C, et al. What accounts for prosocial behavior? roles of moral identity, moral judgment, and self-efficacy beliefs[J]. The journal of genetic psychology, 2018, 179(5): 231 – 245.
[42] BROOKS J, BOCK T, NARVAEZ D. Moral motivation, moral judgment, and antisocial behavior[J]. Journal of research in character education, 2013, 9(2): 149 – 165.
[43] REYNOLDS S J, CERANIC T L. The effects of moral judgment and moral identity on moral behavior: an empirical examination of the moral individual[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07, 92(6): 1610 – 1624.
[44] DE LEEUW A, VALOIS P, SEIXAS R. Understanding high school students' attitude, social norm, perceived control and beliefs to develop educational interventions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J]. Procedia -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2014, 143(8): 1200 – 1209.
[45] WANG J, LIU R D, DING Y, et al. What influences chinese adolescents' choice intention between playing online games and learning? application of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with subjective norm manipulated as peer support and parental monitoring[J]. Frontier in psychology, 2017, 8(4):1 – 10.
[46] HAINES R, STREET M D, HAINES D. The influence of perceived importance of an ethical issue on moral judgment, moral obligation, and moral intent[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08, 81(2): 387 – 399.
[47] LIM V K G, SEE S K B. Attitudes toward, and intentions to report, academic cheating among students in Singapore[J]. Ethics & behavior, 2001, 11(3): 261 – 274.
[48] MCCABE D L. Cheating among college and university students: a north American perspectiv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educational integrity, 2005, 1(1): 3 – 13.
[49] REIDENBACH R E, ROBIN D P, DAWSON L. An application and extension of a multidimensional ethics scale to selected marketing practices and marketing groups[J]. Journal of the academy of marketing science, 1991, 19(3): 83 – 92.
[50] IYER R, EASTMAN J K. Academic dishonesty: are business students different from other college students? [J]. Journal of education for business, 2006, 82(2): 101 – 110.
[51] ARHIN A O, JONES K A. A multidiscipline explor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perceptions of academic dishonesty: are nursing students different from other college students[J]. Nurse education today, 2009, 29(7): 710 – 714.
[52] CLARKE R, LANCASTER T. Eliminating the successor to plagiarism? Identifying the usage of contract cheating sites[C]//Proceedings of 2nd international plagiarism conference. Newcastle upon Tyne: Northumbria Learning Press, 2006: 19 – 21.
[53] HAYES A F. Process: a versatile computational tool for observed variable mediation, moderation, and conditional process modeling [EB/OL]. [2021 – 02 – 10]. http://www.afhayes.com/ public/process2012.pdf.
[54] MACKINNON D P, FAIRCHILD A J, FRITZ M S. Mediation analysis[J].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pgy, 2007, 58(1): 593 – 614.
[55] HENSLEY L C, KIRKPATRICK K M, BURGOON J M. Relation of gender, course enrollment, and grades to distinct forms of academic dishonesty [J]. Teaching in higher education, 2013, 18(8): 895 – 907.

[56] NEWTON P M. How common is commercial contract cheating in higher education and is it increasing? a systematic review[J]. In frontiers in education, 2018, 3(8): 1－18.
[57] 胡婧坤,刘培一. 2000－2009 年国内学术不端行为研究综述[J]. 图书情报工作,2010,54(20):144－148.

作者贡献说明：

吴月华：研究设计，问卷收集及数据分析，论文写作；

胡杰：数据分析，论文写作；

李武：研究设计，数据分析。

A Study of the Impact of Social Norm on College Students' Online Academic Misconduct

Wu Yuehua　Hu Jie　Li Wu
School of Media & Communication,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and extensive use of digital educational resources, academic misconduct is characterized with new features and significant increase. To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king mechanism of online academic misconduct,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social norm exerts influence on online academic misconduct, and examines the mediating variables in between. [**Method/process**] Given the increasing social nature of academic misconduct in the Internet environment, we adopt a micro perspective to examine the specific influence mechanism of social norm on online academic misconduct. Drawing upon Bandura's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of morality and the four-component model by Rest, a sequential mediation model of perceived importance and moral judgement is built and tested with survey data collected in three universities in Shanghai. [**Result/conclusion**] Results show that social norm exerts significant direct and indirect effects on online academic misconduct. The indirect effect is generated through two mediating paths: the independent mediating effect of moral judgment; the sequential mediating effect of perceived importance and moral judgment. While adding to the literature of academic misconduct by offering new perspective on this issue, the findings can facilitate more accurate and targeted measures to curb and regulate online academic misconduct.

Keywords: social norm　perceived importance　moral judgment　online academic misconduct　college students